长征中的女红军们

1984年,76岁的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(Harrison Salisbury)怀揣着心脏起搏器,从江西到陕北,用了几个月的时间,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进行了实地采访,随后写下了《长征:前所未闻的故事》这本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书。

鲜为人知的是,与他一同出发的还有他的妻子,70岁的夏洛特·索尔兹伯里(Charlotte Salisbury),她以日记的形式详尽记录了重走红军长征路时的经历和遭遇,写下了《长征日记:中国史诗》一书。

据相关统计,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同志有蔡畅、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贺子珍等30人。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女同志有李贞、陈琮英、马忆湘、蹇先任、蹇先佛等20多人。参加红军长征的妇女,以红四方面军最多,有2000多名,曾编成妇女独立师。参加红25军长征的有周东屏、戴觉敏等7名女性,人们称之为"七仙女"。长征途中,物资极度匮乏,甚至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,女红军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意志和毅力,不仅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,还在筹粮、宣传、扩红、照顾伤病员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筹粮的能手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前夕,邓颖超接受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泼斯坦(Israel Epstein)的采访。在交谈中,邓颖超说到长征中除了作战外,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,"在我们到达之前,家家跑光,躲到山上去了。他们把粮食带走,就连做饭的锅、舂米的石碓也搬走了。"粮食是部队的命根子,女同志们发挥自身优势,成为解决这个困难的能手。为了筹粮,女红军们采取了多种方式。

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,是其中一种重要方式。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旺苍县的一个村寨时,得知该地有个横行乡里的恶霸土豪,经过多次侦察,都没有发现他的藏粮地点。女战士郭长春是当地人,为了筹粮,她扮作这个土豪表弟的女儿,另一位女同志扮作丫环,前去探亲。郭长春运用计谋,把藏粮地点摸得一清二楚,最后与埋伏在外的同志里应外合,收缴了这个土豪的粮仓,将多余粮食分给了穷苦百姓。

耐心细致做好群众工作,是筹措粮食的另外一个重要方法。进入茂县后,老百姓几乎跑光了,家家户户关着门,偶尔碰到几个人,也是见面就躲。针对这种情况,女红军刘坚后来回忆说,她们将七八个女战士分为一组,分头到深山里去喊话,宣传红军的政策,请他们放心回家,"有时一天做不通,就接连做几天。搞不到粮食时,两三天吃不上一口饭,饿极了就喝口冷水,工作还得照样做。"后来有的老百姓被她们这种工作作风所感动,或者是把自己的粮食卖一点,或者是偷偷跑来告诉她们哪个山洞里有藏粮。为了不使老百姓受到牵连,刘坚她们通常是绕道而行。

筹粮的工作常常充满危险。一个叫吴顺英的女同志筹粮时被地主家绑了起来,幸亏这家的长工跑去给红军报信才被及时救出。

类似的情况常有发生,但不论怎样的困难和危险,大家从来不叫苦、不畏难,总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成。刘坚说:"大家心里想的是,只要能完成党交给的工作,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,吃点苦,受点累算得了什么。"

宣传的明星

1935年12月27日,中央红军长征刚结束不久,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,毛泽东向台下的听众说:"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,长征是宣言书,长征是宣传队,长征是播种机。自从盘古开天地,三皇五帝到于今,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?""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,只有红军的道路,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。""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,发芽、长叶、开花、结果,将来是会有收获的。"在长征途中的宣传工作方面,女红军发挥了重要作用,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女红军们通过刷写标语、张贴布告、演说演讲等多种形式,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。虽然形式简单,但却产生了极大的作用。在遵义休整期间,她们走上街头,教唱革命歌曲,演出街头剧,发放传单等。在她们的影响和带动下,许多人踊跃参加红军,其中不少就是以女红军为榜样来投身革命的。红一方面军妇女队队长、博古夫人刘群先后来讲道:"就因为我们竭力给各地民众以良好的印象,所以老百姓喜欢我们,整个的长征变成了一个惊人的宣传巡行。"

军内宣传,是女红军们宣传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。无论是行军途中,还是战斗前,都可以看到女红军们进行宣传的身影。刘坚回忆说,在长征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就可以称之为"艺术"了,而从事这门"艺术"活动的大都是女同志,"每次部队行军前,我们通常派出一二支妇女宣传队先期出发,赶在部队即将经过的大路旁或山腰上,做一些简单的准备,待部队路过的时候,就起劲地唱莲花落,数快板,当拉拉队,想方设法地活跃气氛,给部队战士鼓劲。"尤其是宿营休息时,她们却不能休息,她们不顾自身的疲劳,通过说唱等灵活多样的形式,帮助大家消解疲劳、鼓舞士气。

在红军中,康克清、刘英等是做宣传工作的模范,蔡畅经常高唱《马赛曲》等激励大家的斗志。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,能歌善舞,更是被誉为"赤色明星"。

长征中曾任红3军团宣传部部长、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部长等职的刘志坚后来撰文写道:"做好行军途中的宣传工作,目的是使红军指战员在行军途中振作精神,不怕苦,不怕累,不开小差,不掉队。""做好战前和战斗中的宣传动员工作,使部队明确每次战斗任务和意义,在战斗中发扬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,保证每次战斗的胜利。"女红军们生动活泼的宣传,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。

伤病员的天使

参加红25军长征的女同志只有7名,都是护士,照顾伤病员是她们最重要的工作。长征途中,医护条件极为困难,但她们千方百计,因陋就简,用土办法救护伤病员。用过的敷料消毒后继续用,直到破损得拿不起为止;药棉没有了,就拆掉棉衣给伤员包扎;药品不足,就上山采草药。她们以女同志特有的细心和耐心照顾着伤病员,帮助他们擦洗伤口、换药、喂饭。

其实,在长征途中,各方面军的女同志都是医护工作的主力,她们精心照顾着伤病员。正如曾任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的华全双所回忆的:"伤病员铺着我们的被子,盖着我们的衣服。路上没有护士护理,洗伤口、涤血衣、饮水、喂饭,都由我们承担。为了不让伤病员饿肚子,就用裤子装满粮食,挂在脖子上,扛着粮食,抬着伤病员走。休息时,给伤病员演唱自编的小节目,解除他们的痛苦。"

照顾伤病员的女同志们,在伤员多或是没有其他劳力时,还要抬担架。长征途中,女同志们有着"三大员"的称呼:卫生员、担架员、给养员。董必武后来回忆了长征途中女同志抬担架的故事:"值得讲述的,还是那些工作的女同志们。她们到卫生部是担任照料抬担架的民工和看护病员的工作,初出发时差不多有六十副担架,途中一个人要管理三四副……照料民工的女同志跟着担架走,跟得着前面一副,又怕后面的掉队,跟着后一副,前面又没有人照管……有几次民工把担架从肩上放下来,躺在地下不动,无论如何都不肯走,她们中体力健强的,就只好代民工扛肩。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。她们是那样地不怕困难,那样去完成她们所负的任务,是许多男子所望尘莫及的!"

"这样干的有四个女同志",其中之一就是邓六金。在一次行军途中,遇到敌人袭击,抬担架的一个民夫中弹,其他民夫扔下担架就四处逃散了,邓六金抬起担架就走,膝盖磕破,肩膀磨烂了,累得吐血。有的伤病员看见抬担架的女同志肩膀渗血,就要求把他们放下,但女同志听了,掉着眼泪回答道:"只要有我们在,就决不会丢下一个伤员。"刘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:"我们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……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,始终没有丢失一个伤病员。"

时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称赞女同志们英勇得很,"时时处处在慰问和帮助伤病员,总是不知疲倦"。长征途中,正是有了女同志们认真负责、精心细致的照顾,许多伤病员才得以恢复身体、走完长征。这些女同志们是部队后勤的重要保障,赢得了战士们的高度称赞。

长征对女同志来说是一种超负荷的艰难跋涉,她们付出了青春、健康,甚至鲜血和生命;但是,她们又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教育和考验,正如刘坚回忆所说:"在这场教育和考验中,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红军这支革命队伍,充满了温暖和阶级友爱,从而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同红军和革命紧紧结合在一起。"

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、敌人的失败而告终的。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,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,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,正如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所说:"这种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中国革命赖以成功的基础。中国革命将从这些奋斗牺牲的传奇故事中汲取无尽的力量。"这种精神,是不怕任何艰难险阻的红军将士写就的,在这当中,女红军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。

(摘自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 文/钟 波)

徐特立:殚精竭虑 照拂孤儿

在列强入侵、山河破碎、军阀混战、民生凋敝的20世纪初,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,他们失去家人,无依无靠,食不果腹,流浪街头。他们稚嫩的肩膀、渴望的眼神、悲惨的遭遇,引起教育家徐特立的真心牵挂。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,徐特立克服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,毅然接办湖南孤儿院,为孤儿们健康成长竭尽全力。

初任院长,为孤儿生活奔波。湖南孤儿院前身为保赤贫儿院,1913年10月由湘绅易雨恂等创立于湘潭,经费由社会捐助。次年2月,迁到长沙连升街,1917年4月改名为湖南孤儿院,收养孤儿200名左右。徐特立从1917年开始接办孤儿院,到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时离任。在担任院长两年多时间里,他殚精竭虑,照拂孤儿,革除不良恶习,创设一些合宜的业务,打开了良性发展的局面。

当时的湖南孤儿院面临着"钱少人多"的现实困难。其一,湖南军阀滥立苛捐杂税,剥削人民血汗,甚至不惜压缩原来划定的教育经费,慈善事业经费自然也申请无门。其二,源源而来的孤儿,将孤儿院挤得满满当当,孩子们嗷嗷待哺,开销尤为紧张。其三,每月乐捐数额十分有限,难以为继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徐特立承省会人士推举,担任孤儿院院长。

徐特立先后创办了梨江高小、五美高小、长沙师范、长沙女子师范和各种短期训练班,同时还兼任多所学校的课程。徐特立将自己的俸金半数以上用来办学校,一小部分用来帮助清贫学生,自己和家人过得十分清苦。

徐特立从讲卫生、废体罚入手,开始对孤儿院的教育改革,并逐渐培养孩子们形成良好的品德。教育改革,从身心健康开始。"勤、俭、公、实"是徐特立对于好学生提出的标准。勤,就是勤劳、勤快;俭,就是节俭、俭朴;公,就是公正,秉公无私,办事公道;实,就是老实、诚实、真实。

孤儿院卫生情况很差,徐特立采取措施,改善孤儿卫生条件。他令管理员将原来每周只开放一次的浴池,改为每天开放一次,让孤儿轮流沐浴,更换衣衫;室内用药物熏蒸,打扫干净。除了保证孩子们的卫生条件外,徐特立还宣布废止体罚,施行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。在徐特立的坚持下,孤儿院废止了长期以来的体罚陋习,孩子们战战兢兢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

在徐特立看来,孤儿院的老师要像父母一样,要善于抚养,使他们健康成长,很好地看护和保卫他们,让他们知书明理,学会劳动技艺,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;还要使用得法,让他们找到正当的职业,无论种田、做工,或做其他的工作,都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。

教授技能,逐渐适应社会生存。孤儿院的教育经费常常捉襟见肘,徐特立在四处奔走"化缘"的同时,不得不想尽办法开源节流,努力维持孤儿院正常运转。他带领教职工培训孤儿技艺,鼓励孩子们学会谋生技能,并组织孤儿负贩团、军乐队以及制鞋班、织巾班等,走上街头、对外营业,增加孤儿院的收入。

负贩团就是贩卖肥皂、毛巾、牙粉牙刷等日用品。孤儿背上这些物品,沿街叫卖,价钱与商店相同,还可以送货上门,非常方便,加之人们对孤儿多有同情,所以每月可以推销很多货物。军乐队就是选择一些年龄较大的孤儿,学习军乐,编成队伍,以供社会上婚、丧、祝寿等场所租用。租费是由主人家酌情自定作为捐款交纳的,这种做法深得社会人士称许。制鞋班、织巾班就是组织一部分孤儿学习这种轻便的技艺,自制布鞋、毛巾出售。

通过这些举措,孤儿院有了新的资金来源,孩子们也学到了一些基本技能,并开始逐渐适应社会生存。所有收入所得,除大部分用来弥补孤儿院经费短缺外,仍规定抽出一定比例,代孤儿储存起来。
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,徐特立为青年学生的爱国行为所感动,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,学习救国本领,帮助更多的劳苦大众。是年7月,徐特立在安排好孤儿院的后续工作后,离开长沙前往上海,候船出国。此时,湖南孤儿院院长由王冕南接任。不久,王冕南募得一笔善款,在浏阳门外韭菜园建了一栋新院舍,添置了比较齐全的设备,收容孤儿也扩展到800名。面对众人的赞扬,王冕南说道:"这不是我的成绩,饮水思源,应归功于前院长徐老特立!"

在漫长的黑夜里,徐特立就像一束光,照进了孩子们的童年生活,温暖了他们的前行之路。

(摘自《学习时报》 文/叶 松)

李 鑫:把一生交给党

1928年,在云南个旧马拉格锡矿漆黑的矿洞里,一位身穿破布麻衣、面容黢黑粗糙的"砂丁"(背矿的工人)背着沉重的矿石,靠着昏暗的煤石灯,艰难地爬出了悠长的矿洞……"砂丁"们称他为"施大爹",没人知道他的来历,只知道他来的时候文弱白净,短短几个月后已经和大家难分你我。大家也都喜欢他写的歌谣,背矿的时候哼几句,能发泄生存的艰辛,也能慢慢地在黑暗中期待着光明。

这位"砂丁"口中的"施大爹",正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创始人——李鑫。

回滇成立党组织

出生于云南省龙陵县的李鑫,自幼勤奋好学、立志高远。1920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农学系学习,1924年又转到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就读。

1925年秋,李鑫同王德三、王复生等发起成立云南旅京青年进步组织"云南革新社"(后改为"新滇社"),开展马列主义研究,创办进步刊物《革新》(后改为《铁花》)。这一年,李鑫在北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立下誓言:"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,以后种种犹如今日生;以前吃酒吃烟,今后重新做人,把一生交给党。"

1926年夏,李鑫随新滇社南下广州。在广州,李鑫常到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课。同年8月,中共广东区委派李鑫回云南开展工作。11月7日,他在昆明平政街节孝巷主持召开中共云南第一次党员会议,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,点燃了云南共产主义事业的星星之火。

之后,李鑫和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积极开展工农运动,建立统一战线,策动和推动了唐继尧手下的四镇守使发动"二六"政变,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长达10多年的统治。

1927年5月11日,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根据蒋介石的"清党"密令,逮捕了李鑫、王复生等20余人,拘押于五华山看守所。后经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多方营救,被逮捕的20余人终于在1927年6月14日全部出狱。

擦糙皮肤当矿工

1928年1月,李鑫转移到个旧领导工农运动。个旧素有"锡都"之称,然而在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外表下,却有着不为人知的险恶与黑暗。在个旧,受尽资本家剥削的矿工被叫做"砂丁"。当时个旧迅猛发展的锡业生产与资本家的巨额财富,完全建立在对"砂丁"的残酷剥削上。然而,打入矿山内部,并开展工人运动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。

1928年5月,云南省临委书记王德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《云南工作概况》中写道:"个旧矿厂的工作入手困难,资本家不独对工人的剥削是残暴的,并且他们的营业还是秘密的,假如没有亲友或职业的关系,不能进到矿山。"

为了在资本家眼皮底下打入工人内部,细皮嫩肉、书生模样的李鑫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,用坚强的意志从气质和形象上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变。他与"砂丁"同吃同住同劳动,每天吃的是霉烂粗糙的"三子(砂子、石子、稗子)饭",像"砂丁"一样赤条条地下矿洞挖矿背矿,每进出矿洞一次得花近3个小时,每天的劳动在10小时以上,还得忍受监工如影随形的皮鞭。

工矿运动的拓荒人

长期与"砂丁"同吃同住同劳动,化名施鸿祥的李鑫已经和"砂丁"打成一片。李鑫把那些受尽压迫、有革命意愿的"砂丁"组织成兄弟会;把其中斗争意志坚定的再组织成"秘密赤色工会",发展会员60余人,在最先觉悟的"砂丁"中发展共产党员,于此建立了共产党在云南的第一个矿山支部。

1929年4月,李鑫、戴德明在个旧锡务公司马拉格锡矿领导发起了要求加薪、改善工作条件的罢工,取得了胜利。正在李鑫准备发动一次工人武装暴动时,却因他人泄密而被逮捕。同年5月11日,敌人将李鑫押解到蒙自县,16日将其杀害。李鑫就义时年仅32岁。

李鑫在云南党史上开创了"三不朽"功业: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创始人、云南农民运动的先驱、工矿运动的拓荒人。他为党和人民"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"的献身精神,在云岭大地留下了鲜红的一页,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、不懈奋斗,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!

(摘自《云岭先锋》 文/叶之声)

一张珍贵的党证

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,陈列着一张浸染鲜血的珍贵党证(上图)。这张党证四寸见方,白布黑字,平平展展。经历了悠长的时光洗礼,党证上列宁、斯大林的石印头像及书写的文字,仍清晰可辨。

党证的主人陈波,原名陈汉清,于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他先后任红1军第1师第2团某连政治指导员,第1团副营长、营长,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。

1933年12月,红四方面军进行反川军"六路围攻"的战斗。为激励广大党员在战斗中殊死拼搏,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给优秀党员发放党证。经过会议讨论,支部同意为陈波发放党证。材料报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后,很快获得了批准。

陈波领取党证后,缝制了一只小皮囊,别在腰带上,专置党证及用作党费的钱币。

1938年起,陈波历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参谋、参谋长、副团长。1940年年底,太行山区反扫荡刚刚结束,黄崖洞兵工厂遭敌严重破坏,只能勉强生产一些质量不稳定的滚雷。如何用这些滚雷投入战斗,需要部队在试爆训练中积累经验。

1941年3月的一天,陈波为全团官兵示范滚雷的使用方法。在操作过程中,只听"嘣"的一声,滚雷一触即发。顷刻间,硝烟弥漫,陈波倒在血泊里。当剧烈的疼痛把他从昏迷中唤醒时,他已经躺在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台上。经过奋力抢救,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,但失去了一只胳臂。

手术后醒来,他用残留的右手摸到裤带上,发现少了什么,便焦急地问道:"小皮囊呢?"护士将他的血衣翻了个遍,终于找到那个火柴盒大小的小皮囊,从中掏出一张被鲜血浸染的党证。

无论是在艰难漫长的长征路上,还是在后来百团大战及辽沈、平津战役的战场上,这张党证一直被陈波贴身带着。它是陈波一心向党的历史见证,更是他坚定信念的生动写照。新中国成立后,陈波荣获二级八一勋章、二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及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
(摘自《解放军报》 文/李 伶)

《大刀进行曲》的创作故事

"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,全国武装的弟兄们,抗战的一天来到了,抗战的一天来到了……"这首《大刀进行曲》,在"七七事变"不久后问世,很快唱遍全国,成为当时激励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寇的铿锵战歌。

1933年,日寇集结重兵进犯长城。中国军队第29军官兵坚守喜峰口、罗文峪等阵地,同汹汹来犯的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杀。该军组建"大刀队",夜出奇兵,迂回敌后,杀得鬼子落花流水。这是"九一八事变"以来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的首次大捷。日本《朝日新闻》惊呼:"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,而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。"天津《益世报》发表评论说:"中国人永世万代不能忘记喜峰口的英雄。"

1937年"七七事变"爆发,"大刀队"奋起抗战。他们英勇抗敌的事迹传到上海,深深震撼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青年、作曲家麦新。

那是一个安静的早晨,麦新念叨着"抗战的一天来到了",火一般的词句和音符在他笔下涌出……"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!"麦新奋笔疾书,一气呵成写出了《大刀进行曲》的词曲,并在原稿标题下题写"献给廿九军大刀队"。歌曲以描绘抗战将士威风凛凛的身姿为开端,用刚健旋律、激昂词语,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高昂斗志和必胜信念。歌曲是表现战斗的进行曲风格,又具有突出的民族风格,成为中国音乐家创作新军歌的代表作。

后来,麦新还根据群众的试唱进行了修改。第一句歌词"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",本来麦新在曲谱中写的是一拍一音,但在群众传唱时却成了切分音。麦新知道后,赞同地说:"还是群众唱得对!一开始用切分音符更能表现对敌人的无比仇恨。"的确,歌曲这样一唱,便具有了火山爆发般的强大力量,唱起来像大刀一样锋利,像冲锋号一样响亮。麦新便按照群众的唱法,修改了自己的曲谱。

随后,这首激昂的抗日战歌很快传遍了城镇乡村、前线后方,传唱于抗日军民中,鼓舞着千千万万抗日英雄去冲锋陷阵。1949年7月,周恩来在一次军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座谈会上,提到这首歌:"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,大家又唱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《黄河大合唱》《游击队歌》,很多热血青年在党的感召下,就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到延安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来的……"

伟大的时代,应该产生与之匹配的伟大的文艺作品。抗战岁月里,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子孙用刀枪、用热血,奋勇抗争、保家卫国。每次听到这首歌曲,人们眼前就仿佛浮现抗日英雄们高举革命红旗、挥舞大刀长矛,"抗日的烽火已燎原"的画面。

几十年来,这首歌曲广受人们的喜爱,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。在敌人来犯时,在将士出征前,在历次抗战胜利纪念大会,在国庆庆典上,我们总能听到这首充满英雄气概的歌曲。

军歌中有铁血豪迈,军歌中蕴藏着铁与钢。时间已过去了85年,这首气壮山河的抗日歌曲,依然能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共鸣,依然能叫人热血沸腾、斗志昂扬,显示出其久远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战斗力。

著名作家高洪波曾写过一首《致麦新烈士》的诗,诗中说:"这大刀很沉重,很明亮/插在中国的历史里/插成一座刀碑……"

麦新,于1947年6月6日遭反动土匪袭击,壮烈牺牲。他的名字,将和《大刀进行曲》一起,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。

(摘自《解放军报》 文/袁丽萍)

《大刀进行曲》(油画) 李明峰作